

由内而起的道德瓦解：尤里·别兹梅诺夫意识形态颠覆框架在中国

共产党爱国主义教育与信息控制体系（1949-2026）中的检验

Free China Movement

Version: v1.0 | 2026-10-20

© 2026 Free China Movement. All rights reserved.

Canonical edition: <https://freechina.live/%e7%ae%80%e4%bd>

[%93%e4%b8%ad%e6%96%87-simplified-chinese/zh-bezmenov-](#)

[demoralization-ideological-subversion-ccp-patriotic-education/](#)

This document was generated from the final published text. The

PDF is the authoritative download copy; the online edition above is

the version of record.

由内而起的道德瓦解：尤里·别兹梅诺夫意识形态 颠覆框架在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教育与信息控制 体系（1949-2026）中的检验

摘要

尤里·别兹梅诺夫是苏联叛逃者、前诺沃斯蒂通讯社记者，自称曾为克格勃工作。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共产主义颠覆的决定性武器不是间谍活动，而是

一个他称之为意识形态颠覆的缓慢过程；其第一个、也是最漫长的阶段——道德瓦解——需要十五至二十年，即教育一代人所需的时间。他声称，一个道德瓦解的人“无法评估真实信息”：事实、文件和照片再也抵达不了他，因为他借以感知现实的框架本身已被改变。本文根据别兹梅诺夫的主要语料——1983 年洛杉矶讲座、1984 年与 G. 爱德华·格里芬的访谈，以及《Love Letter to America》（1984）——重构其框架，并逐条检验其与中国共产党（CCP）有独立文献记录的实践。该记录包括 1942–1952 年的思想改造运动、1989 年后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及其以受害者叙事取代阶级斗争叙事的转向、关于中国大陆审查逻辑的当代研究，以及 2021 年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小学到大学进入教材的整合。本文发现两者存在显著但不完全的契合，以及一个决定性的分歧：别兹梅诺夫描述的是一个外部颠覆者作用于一个自由社会，而在中国大陆，颠覆者就是主权统治者本身；道德瓦解运行的不是一代人，而是三代；“常态化”不是该过程的最终阶段，而是其起点条件。本文还以 1989 年和 2022 年 11 月白纸抗议的证据检验别兹梅诺夫最强的论断——不可逆性，发现该论断被夸大了：这一过程深厚、制度化且自我强化，但同时也受到挑战，并不完整。结论认为，逆转它同样是代际的工作，并列出自中国运动政策工作中已经提出的制度性补救措施——开放档案、真相委员会、受害者登记册和宪政史教育。

关键词：尤里·别兹梅诺夫；意识形态颠覆；道德瓦解；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改造；审查制度；历史记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中华民国（台湾）

1. 引言：当事实无言时

每一位在党国体制下从事异议活动的实践者都熟悉这样的经历：你向一个完全在该体制内受教育的人出示一个有文献依据的事实——一个日期、一张照片、一份伤亡记录、一份法院判决——这个事实却落不到实处。它不是被审视后驳回，而是在抵达的瞬间就被重新归类。文件是伪造的，照片是摆拍的，来源是敌对的，提问本身就是不忠。论证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不是因为证据薄弱，而是因为本该权衡证据的官能已经被预先占领。

尤里·别兹梅诺夫为这种经历命名并给出了机制。别兹梅诺夫（1939–1993）曾在苏联诺沃斯蒂通讯社工作，按他自己的说法也曾为克格勃工作，1970 年从苏联驻印度新德里代表团叛逃，定居西方。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讲座和著述中，他提出，克格勃的精力中只有约百分之十五用于间谍活动，其余全部用于一个缓慢而公开的意识形态颠覆过程，其目的是“将每一个美国人对现实的感知改变到这样的程度：尽管信息极为丰富，却没有人能够为了捍卫自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社区和自己的国家而得出明智的结论。”[1]

他的论述今天主要以病毒式碎片的形式流传——短视频剪辑、语录图片、其他语言的转述。这些碎片的政治煽动性和学术不可靠性大致相当。因此，本文做了病毒版本没有做的两件事。

第一，回到主要语料，按别兹梅诺夫实际的说法重构其论述：是什么顺序、有哪些限定、不同讲述之间的文本有何差异。第二，不把他的框架当作启示，而是当作假设，用他没有分析过的一个案例来检验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在这个国家，执政的党同时拥有学校、批准教材、发放媒体牌照、运营审查机构。

由此产生三个研究问题：

1. 别兹梅诺夫的模型究竟是什么——它的阶段、时长、机制和终点论断是什么？
2. 中国共产党有文献记录的实践——思想改造、爱国主义教育、教材政策、审查制度——与该模型的契合度有多高，又在何处分歧？
3. 他的终点论断是否为真：在受影响的一代人之内，已完成的道德瓦解是否不可逆，只能通过教育新一代来逆转？

方法是分级取证。A 级证据由原始文件和官方文本构成。B 级证据由同行评审或大学出版社的学术著作构成。C 级证据由叛逃者和参与者的证词构成，包括别兹梅诺夫本人：可用于证明证人说了什么、相信了什么；仅在有独立佐证的情况下，可用于证明机构事实。D 级——病毒式语录图片、无署名的转录、社交媒体转述——仅作为该框架当今接受状况的证据，绝不作为任何事实主张的证据。本文关于中国共产党实践的任何事实主张，都不单独建立在别兹梅诺夫一人之上。

2. 经过验证的别兹梅诺夫语料

承载该框架的主要来源有三。

第一个是 1983 年在洛杉矶发表的讲座，留有视频记录；别兹梅诺夫在其中以早期形式阐述了意识形态颠覆的四个阶段和道德瓦解的人之论述。第二个是 1984 年与 G. 爱德华·格里芬的访谈，以《Soviet Subversion of the Free World Press》为名出版，其中包含最完整的口述版本。第三是他的著作《Love Letter to America》（洛杉矶，1984），以其化名托马斯·大卫·舒曼出版，以印刷形式呈现了该框架，包括一张为各阶段标注时长的图表：道德瓦解十五至二十年；动荡化二至五年；危机二至六个月；常态化无限期。[2]

道德瓦解的人之论述，按 1984 年访谈版本，原文如下：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接触真实信息已经不再重要了。一个道德瓦解的人无法评估真实信息。事实对他说明不了任何事。即使我用信息、用确凿证据、用文件、用照片向他倾泻。即使我强行把他带到苏联，指给他看一个集中营，他也会拒绝相信——直到他的肥屁股挨上一脚。当军

靴踩碎他的睾丸，他才会明白——但在此之前不会。这就是道德瓦解处境的悲剧。”[3]

有两处文本上的注意事项对后文各章很重要。第一，这段论述存在不同版本：1983 年讲座版本较短，现代的语录集经常悄悄把两个版本拼接在一起。本文引用 1984 年访谈版本，较短的形式视为它的节录。第二，别兹梅诺夫关于自身经历和体制的主张——他自己的级别、克格勃精力十五比八十五的划分、到 1984 年美国道德瓦解已经完成——属于 C 级证词。其中一些在大体轮廓上可信，与苏联“积极措施”实践的有文献记录的做法一致；但在没有本文所给的分级说明的情况下，不应被复述为既定事实。没有疑问的是文本本身：这就是他在 1983-1984 年间、在互联网让它出名之前，公开记录在案的说法。这使得该语料可以按本文使用它的方式来使用——作为一份有日期、有署名的模型陈述，由一个自称操作过它的体系的叛逃者提出。

还有一处关于接受史的提醒。四十年后，别兹梅诺夫成了某些受众心中的先知形象，他们把“道德瓦解”当作对任何政治分歧的总体解释。这种用法本身是他论点的小小演示，也是对它的巨大扭曲。他的模型命名的是一个特定机制——由国家主导的、代际长度的、以感知而非观点为目标的再教育——一旦被拉伸为“不同意我的人都被洗脑了”，它就失去了全部分析价值。第 7 章会回到这个限度，因为一个能解释一切的框架什么也解释不了；本文对中国大陆案例的检验，只有在该框架也可能失败时才有意义。

3. 框架重构

别兹梅诺夫的模型有四个要素。

定义。意识形态颠覆，也称为积极措施或心理战，是将目标人群对现实的感知改变到这样一个程度的过程：尽管信息丰富，它却无法为了自我防卫而得出明智的结论。注意其目标是什么：不是相信任何特定的命题，不是政党忠诚，甚至不是观点。目标是感知——在一切后来的观点形成之前，就把世界预先分拣为可信与荒谬、忠诚与敌对、可见与不可见的那个先在框架。控制了这种分拣的颠覆者不需要赢得辩论。他只需要决定哪些论证能作为论证被听见。

阶段与时长。道德瓦解（十五至二十年）通过教育、媒体、文化和宗教起作用；别兹梅诺夫强调，它需要至少整整一代学生暴露在颠覆者的框架之下，且没有有效的制衡。动荡化（二至五年）收缩到要害：经济、外交、国防。危机（书中图表为二至六个月；某些口述版本压缩为几周）带来权力和结构的暴力更迭。常态化（无限期）是随后的犬儒式稳定，在一个把自己呈现为危机终结的新秩序之下。这些时长是该模型最独特的特征。道德瓦解之所以缓慢，是因为它的工作单位不是选举周期或新闻周期，而是一个学龄队列。

机制：程序化反应。对于被这一过程塑造的人，别兹梅诺夫说：“他们被程序化

了，会以某种固定的模式对某些刺激进行思考和反应。即使你让他们接触真实的信息，你也无法改变他们的想法。即使你证明白就是白、黑就是黑，你仍然无法改变其基本的感知和行为逻辑。”[4]“程序化”一词应按本文的分析意义来读，而非技术意义：一种通过多年学校教育和媒体环境习得的条件性默认，在反思之前就触发，因而很少真正遭遇反思。

终点论断。别兹梅诺夫在终点提出了两个强论断。第一是代际内的不可逆性：对道德瓦解的人而言，接触真实信息“已经不再重要”，改变需要“另一代”以不同方式受教育的人。第二关乎目标社会中颠覆者的早期合作者——活动人士、学者和宣传者，他们协助这一过程是期待继承权力。在访谈中他预言，新秩序到来之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将被消灭，因为他们的幻灭一旦到来，会使他们成为新秩序最危险的对手。[5]这两个论断都可以用不同方式检验，第5章和第7章将用中国共产党的记录来检验它们，而不是预设它们。

在检验开始之前，必须强调原始模型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因为中国大陆案例把它反转了。别兹梅诺夫的颠覆者是外部的、被否认的：一个外国情报机构在一个不承认正在发生什么的开放社会内部活动，把该社会自身的自由——它的大学、报刊和娱乐业——当作投送系统。中国大陆案例几乎处处相反：颠覆者就是政府，过程是官方的、强制的，投送系统不是被利用的自由，而是国家垄断。第5章的问题是：当这一个变量被翻转，模型会发生什么。

4. 别兹梅诺夫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改造，1942–1976

中国共产党发现感知可以被再造，并不需要一本苏联手册；它的实践比别兹梅诺夫的描述早了四十年。本章是有意简略的：它确立的是在先性，而非完整历史，也不提出新的档案主张。

模板在延安奠定。整风运动于1942年2月正式发动，使干部和知识分子经历学习、坦白、批评与自我批评、干部审查的循环，抵达唯一被授权的路线和唯一被授权的解释者。[6]这些技术——集体学习指定文本、书面自我检查、公开承认思想错误、组织结论——成为可重复使用的政治技术；党掌握国家政权后，它被远远施用到战时根据地之外。

1949年后，这项技术被推广到新国家的受教育人口。1951–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周恩来总理号召知识分子改造思想之后发动，要求教师和大学教职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抛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人民日报》所称的“欧美反动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受过海外教育的知识分子被迫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通道；课程按苏联模式重组，被判定为伪资产阶级的学科——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被取消。[7]思想改造（sixiang gaizao）及其后来较温和的行政后继者思想工作（sixiang gongzuo），命名了一种连续的制度实践：党主张管辖的不仅是行为，还有产生行为的内在框架。

随后的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摧毁了许多在百花齐放时期发言的知识分子；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关闭大学，把一代学生驱散到农村，使仪式性批斗成为群众性经验——在本文需要的一点上属于同一谱系：它们以奖赏和恐怖教会了体制内感知的实用规则。什么可以说；什么在公开场合不许记住；哪些受害者算数，哪些不算；哪些问题会标记提问者。一个人口不需要在私下相信官方说法，这些规则就能起作用。它只需要在很早、很彻底地学会第3章的分拣机制：哪些事实能作为事实被听见。

这份早期记录中已经出现两个与别兹梅诺夫模型不同的地方，两处都对检验很重要。第一，早期的中共运动是强制的、运动式的——以运动整风，恐怖是内在工具——而别兹梅诺夫的道德瓦解被描述为缓慢的、基本非暴力的、依赖目标自由的。中国大陆体制后来会获得别兹梅诺夫描述的那种缓慢的、课程化的形态，但它从未放弃强制形态；它同时持有两者。第二，目标从一开始就是内部的。中国共产党不是在颠覆对手的社会；它在重塑自己的社会。在中国大陆，道德瓦解是统治技术，不是渗透技术。

5. 1989年后的体系化：爱国主义教育运动

如果说有一个时刻把继承来的实践转化为现代的、代际长度的教育体系，那就是1989年6月4日之后。那个春天的民主运动——北京和数百个其他城市的学生与市民要求政治改革，党国以军事力量终结了它——在领导层自己的事后检讨中，是一场教育失败。邓小平自己的事后检讨指向同一方向。在1989年6月9日的讲话中，他把抗议框定为未能坚持党的领导、对西方价值观思想松懈的产物，号召在年轻人中巩固党的正统；在他陈述的动乱教训中，他把它说成一条直接指示：“要加强思想教育。”郑王（Zheng Wang）对这一时期的记述补充了领导层更尖锐的自我批评——党在教育上的失败、忽视教导年轻人中国曾是什么样、革命付出了什么代价，是一个严重错误。[19]补救办法不是旧式运动那种间歇性运动，而是一套课程。

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于1991年启动，1994年以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成文化，明确针对青年。[8]赵穗生（Suisheng Zhao）在奠基性研究中把结果称为“国家主导的民族主义”：一场在天安门之后以爱国而非阶级斗争为基础重建党的权威的运动。[9]

郑王的《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2）详细记录了机制。[10]这场运动在教给每个学童的官方历史叙事中完成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替换：

1. **从阶级斗争到民族斗争。**中国大陆现代史的组织性冲突不再是内部的——地主对农民、资本家对工人——而变成了外部的：中华民族对抗曾羞辱它的列强。

2. **从胜利者叙事到受害者叙事。**较早的毛主义叙述——党赢得了民族独立、让民族站起来——被一个以西方和日本之手造成的“百年国耻”为中心的叙述取代；这场创伤只有作为民族救星和持续保卫者的党才能回应和复仇。
3. **从课本到总体环境。**该叙述不仅制度化于重写的历史课本——从 1992 年起高中和初中都必修，并考入大学入学考试——还制度化于博物馆、纪念碑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网络：一百个国家级“示范基地”，郑王指出，其中四十个设在与外国冲突的记忆遗址。[11]

对照第 3 章读，它与别兹梅诺夫机制的对应是紧密的，应该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场运动的工作单位是学龄队列。它的宣称对象不是一套观点，而是一种历史意识——郑王的“受选—神话—创伤复合体”——在学生拥有任何独立核查手段之前安装，并以奖励其再生产的考试不断刷新。它的内容被设计成这样：在其中形成的人，此后把对党的批评感知为不是一个有待权衡的政治立场，而是民族屈辱的重演：批评者在听者的先在框架中，自动与伤害民族的外国势力归为一类。这就是别兹梅诺夫的程序化反应，只不过生产它的不是利用开放社会的外国情报机构，而是一个运营强制教育体系的教育部。

袁伟时的案例显示了这个系统如何防卫自身的内部例外。2006 年，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在《中国青年报》周日副刊《冰点》发表文章，批评中国大陆教材教授不完整的历史，助长盲目民族主义和封闭的排外思维；他用一句后来出名的话形容年轻一代是吃狼奶长大的羊。两周之内，该副刊被关闭，编辑被撤职。[12]这个插曲很小，因而有用。没有外国颠覆者参与。一位有资历的体制内人士试图在一份党的报纸上，从源头——课本——修正感知框架，系统的回应是关闭这个场域。由内而起的道德瓦解保护课程的方式，正如别兹梅诺夫的颠覆者本该保护其行动的方式：不回答修正，而是终结使修正能被听见的条件。

本章的主张应该像它提出时一样谨慎地划界。爱国主义教育并不等同于苏联的意识形态颠覆，它的许多元素——民族历史、纪念场所、公民自豪感——在民主国家也有对应，包括中华民国（台湾）和美国。本文确认的差异不是爱国主义内容的存在，而是四个条件的合取，这四个条件在开放社会中并不同时成立：单一的授权叙事；垄断的提供者（任何竞争性的课本、报刊或平台都不得系统地反驳它）；以考试和就业激励其再生产；以及袁伟时案及此后众多案例所证明的、对公开修正的惩罚。在这四个条件下，历史教育在功能上就成了别兹梅诺夫描述的东西：代际安装的感知框架，在未来的信息能被评估之前就先把它分拣完毕。

6. 数字时代与习近平时代的延伸

如果成年人的信息环境每天都与之矛盾，学校里安装的框架就会衰减。在中国大陆它不会，因为第二套系统——信息控制——负责维护。有两组证据描述了它如何运作。

第一组是实证的审查研究。Gary King、Jennifer Pan 和 Margaret E. Roberts 分析了近 1400 个服务中审查前捕获的数百万条中国大陆社交媒体帖子，发现审查项目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对国家、领导人或政策的批评：即使激烈的批评本身，被删除的可能性并不更高。被删除的是代表、强化或推动集体行动的内容——正在发生或未来可能发生的社会动员，无论它是亲政府还是反政府。[13]这个发现细化了别兹梅诺夫，而不只是证实了他。该系统的最高优先级不是让每个臣民相信授权叙事；而是阻止臣民在公开场合发现别人也和自己一样不信——让一个私下里道德瓦解或私下里异议的人群在公开场合保持原子化。感知在学校被治理；表达在网上被治理；而两者的连接点是集体行动，第二套系统正是为了预先阻止它而存在。

第二组证据是习近平时代意识形态教育以个人化形式重返课程中心。2021 年 7 月，国家教材委员会和教育部发布指导纲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各级教材；从 2021 年秋季学期起，中国大陆中小学开始使用五卷本习近平思想学生读本，从小学低年级到大学分级编写；2023 年 8 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被增设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材。[14]委员会的官方理由本身就是本文论点的 A 级陈述：教材“体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意志，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方向和质量”，小学阶段要培养学生“对党、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爱与正确认识”。[15]

把这两个延伸并列起来看，到 2021-2023 年，中国大陆体系满足了一个别兹梅诺夫从未用在任何国家、包括他自己祖国身上的描述。他描述的苏联体制在国外尝试道德瓦解，而国内人口靠宣传加恐惧的粗糙混合物维持；它在一个长寿的一生之内就崩溃了。中国大陆体制把三者结合在一起：（a）童年安装的、考试强制的历史叙事；（b）审查机构，其经实证证明的优先级是阻止集体表达而非管控私人批评；（c）一位领导人的学说，以其名义进入每个学段的课本。这是配备了部委、预算、考试大纲和防火墙的道德瓦解——不是针对对手施行的，而是作为统治者臣民的日常教育施行，并作为例行行政而非运动，为每一届新生代续新。

7. 框架检验：契合、断裂与反转

契合之处。中国大陆记录以别兹梅诺夫的美国材料从未达到的精确度证实了该框架的核心机制。感知框架在童年通过强制的、以考试奖励的叙事安装（第 5 章）；在成年通过一个信息系统维护，该系统的实证优先级是阻止集体表达而非纠正私人信念（第 6 章）；其特征性产物正是别兹梅诺夫预言的反应——不是论证过的分歧，而是把不受欢迎的事实预先重新归类为外国的、伪造的或不忠的。时长论点也契合，而且被超越了：别兹梅诺夫需要十五至二十年塑造一代人，中国大陆体系已经连续塑造了三代，每一代都由在上一代中形成的人来教育。

反转之处。原始模型有两个要素在中国大陆案例中反转。第一，施动者：颠覆者

不是外部的，也不是利用目标社会的自由；它是主权者，通过强制起作用。第二，序列：常态化——一个把自己呈现为永久稳定的后危机秩序的统治——不是过程走向的终点；自 1949 年以来它一直是基线条件，每一轮新的道德瓦解都在它之内作为例行治理施行。为渗透而建的模型必须被重新限定，而不只是被套用，当渗透者手握教育部的时候。

合作者论断须谨慎处理之处。别兹梅诺夫预言，颠覆者的早期帮手一旦用处耗尽就会首当其冲被消灭，因为他们的幻灭会使他们变得危险。中国大陆历史提供了与之押韵的插曲——1956-1957 年响应百花齐放邀请的知识分子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摧毁；每一场运动的盟友被下一场运动抛弃——但押韵不是一般规律的证明，本文不把别兹梅诺夫的预言提升为规律。可辩护的主张更窄，且有文献支持：一个奖励告密、惩罚独立判断的系统，会在它的工具的独立判断比其用处活得更久时，可靠地反噬自己的工具。这是激励结构的属性，不是预言。

断裂之处：不可逆性。别兹梅诺夫最强的论断也是最弱的，中国大陆本身提供了两次反证。1989 年，在思想改造四十年、按他的说法本应已经形成一代不可触及的人十年之后，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大陆公民——打头的是完全在体制内受教育的学生——占据全国各地的公共空间，要求政治改革、言论自由和负责的政府。体制以军队回应，这在政权自己的行为中就是一种承认：教育没有完成它的工作。

2022 年 11 月，它再次发生，形式直接评论了本文的主题。乌鲁木齐一栋被封控的公寓楼发生致命火灾后，数千人走上上海、北京等城市的街头，举行 1989 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性示威，反抗清零政策，高喊“我们要人权”“共产党下台”，举起白纸作为审查的象征——白纸抗议。[16]一张白纸正是对道德瓦解状态的精确否定：一个再也无法说出自己意思的公民，转而公开展示自己被禁止言说的事实，而每一个看到的人都懂。这是在旨在使其失灵的条件下正确运作的感知。抗议被镇压，参与者被拘留，有人被监禁——而国家的清零政策在几天之内就被放弃了。因此，按证据，中国大陆的道德瓦解最好被描述为深厚、制度化、持续续新——同时是不完整的、有争议的；当生活经验（一场封控、一场大火、一只军靴，用别兹梅诺夫自己残酷的意象）在大规模上与被安装的框架矛盾时，它会突然在公开场合失效。

这个发现的意义超出学术准确性。如果这一过程在一代人之内真的不可逆，唯一理性的回应就是绝望或等待。正因为它不完整，补救才是一个实践问题；最后一章转向的正是补救——以制度而非口号来具体说明。

8. 解决方案：重建判断力

别兹梅诺夫自己的逻辑决定了任何补救的第一原则，也排除了最常见的那一种。如果受伤的是评估信息的官能，那么仅仅提供更多信息——更多的事实、文件、照片——就不可能是解药，因为那是把受损的官能当作完好的官能来对待。补救

必须重建官能本身：公民在决定是否相信一个主张之前，先分拣这个主张所用的源批评、逻辑推理、历史记忆和比较判断的习惯。而因为伤害是代际的、制度的，补救也必须是代际的、制度的。本章列出一个五部分方案。它的元素不是在这里发明的：前两个重述自由中国运动已经发表的政策，第三个引用并发展该运动现有的公民教育项目——补救基础设施，它不寻常地已经存在，并且已经在线运转。

8.1 开放档案，点名受害者，在记录上确立真相

自由中国运动的十月一日政策提案——把这一天经未来民主授权的立法机构改造为国殇与自由日——具体规定了制度核心：“全国受害者登记册和数字档案；开放党和国家档案；独立的真相委员会；国家纪念与公共教育；对经核实的受害者给予赔偿、平反和司法救济，个人责任以证据和正当程序为依据，而非集体惩罚。”[18]

每个元素都回答道德瓦解的一个具体元素。开放的档案在根上回答叙事垄断：只有在能证伪它的文件还被列为机密时，党的历史才能作为唯一的历史被教授。受害者登记册回答决定哪些受害者算数的分拣机制：它把他们全部点名计数，凭证据。真相委员会回答程序化反应——把事实反射性地重新归类为不忠——它创造一个权威的公共场合，在全社会面前把事实作为事实来听、按正当程序检验。这都不是事实倾倒。这是在建设一些机构，它们的日常运作通过参与训练公民评估证据。

8.2 在防止新垄断的条件下改革教材

教材改革是显而易见的补救，也是危险的补救：一个过渡政府如果只是用自己的授权叙事替换党的授权叙事，就会在新的管理之下复制道德瓦解的结构。因此保障措施是提案的一部分，而不是事后补丁：（a）竞争性的教材，按公开的事实标准审批，没有唯一的授权文本；（b）基于史料的历史教学，学生从文件——包括相互矛盾的文件——而不是从结论出发学习；（c）在与其他任何题目相同的证据标准下，明确教授被压制的记录，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 1989；

（d）考试改革，使评估奖励对史料的评价而非对叙事的再生产。成功的衡量不是下一代相信了另一套命题，而是它能说清一个命题是如何确立的，并且在一个命题没有确立时能说出来。

8.3 作为补救的公民教育：CCE-100 项目

事实需要官能；官能靠一题一题的练习建成。这就是自由中国运动公民教育项目的设计——《政治迷思 100 问：民主、自由、人权与现代公民》（CCE-100），发表在 FreeChina.live 公民教育目录（<https://freechina.live/civic-education-100-questions/>）。该项目陈述了自己的方法，而这个方法

本身就是反道德瓦解教学法的范本：

“以下 100 个条目为研究问题，不代表已证实的政治宣传原文或既定结论。每个问题都将经过原始论述收集、事实核查、比较研究与独立审稿，正式文章经编辑批准后将逐条添加链接。”[17]

从问题而不是从结论出发、把验证方法与结果一起公布的课程，训练的正是党的课程旨在关闭的官能。它的十个章节直接对应本文第 5 章和第 6 章记录的症状：

道
德
瓦
解
症
状
（
本
文
）

CCE-100 补救

对
党
的
批
评
被
感
知
为
不
爱
国
、
受
外
国
煽
动

第 3 章——CCE-021 爱国与爱党：爱国是否等于热爱执政党？；CCE-022 批评政府：批评政府是否等于不爱国或危害国家？；CCE-029 国家与政府：国家、政府与执政党是同一回事吗？

历
史

第 5 章——CCE-045 大跃进：大跃进的历史真相与责任归属是什么？；CCE-046 文化大革命：文革为何发生？如何

CCE-100 补救

防止悲剧重演？；CCE-047 六四事件：1989 年发生了什么？为何保存记忆如此重要？；CCE-050 档案公开：历史档案公开对真相与和解有何意义？

第 9 章《宣传、信息与逻辑》——CCE-081 官方媒体核查：如何核查官方媒体发布的信息？；CCE-082 外国媒体核查：外国媒体报道可信吗？如何交叉验证？；CCE-085 审查与谣言：信息审查与谣言传播之间是什么关系？；CCE-086 信息茧房：算法推荐如何塑造人们的政治认知？；CCE-087 因果推理：如何区分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常见的因果谬误有哪些？；CCE-088 政治口号：政治口号如何影响思维？如何解剖一句口号？；CCE-090 数字引文核查：统计数字与文献引文应如何核查？

第 1 章——CCE-005 选举能力：普通公民是否具备做出理性政治选择的能力？；第 10 章——CCE-091 权利与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应包含哪些权利知识？；CCE-100 公民责任：现代公民应承担哪些政治责任？

CCE-100 补救

第 7 章——CCE-061 台湾民主化：台湾民主化转型的关键因素是什么？；CCE-062 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的实践说明了什么？；CCE-069 转型道路：从威权向民主转型的路径有哪些？

有两个特征使 CCE-100 不只是一份为假设的未来准备的提纲。第一，它现在就在运转——目录已发表，条目在生产中，完成的文章经批准后从目录链接——因此今天就能送达补救已经能触及的受众：海外华人、防火墙外的学生、翻墙的中国大陆读者。补救不必等到转型才开始；按别兹梅诺夫自己的时间表逻辑，现在就为现在在校的一代启动十五至二十年的时钟，正是关键所在。第二，它的问题优先的方法可以作为§8.2 后转型课程的模板输出，因为它在实践中演示了公民教育与反宣传的区别：反宣传安装一个对立的叙事；公民教育安装一种方法，并且接受风险——这也是它诚意的证明——一个掌握了方法的公民可能得出教育者没有预期的结论。

8.4 恢复一个判断力可以行使的信息环境

公民教育经不起与一个旨在使其原子化的信息系统的接触。第 6 章的审查发现精确地定义了改革目标：一个以压制集体表达为优先的系统，必须被一个以集体表达为公共主张的常规检验的系统取代。具体而言：废除防火墙和出版前审查；依

法而非按党的指示独立发放媒体牌照；以平台透明义务取代平台审查义务；以法律保护现行体制最可靠地惩罚的那些行为——报道、存档、纪念和组织。顺序很重要。一个按§8.3受过训练的公民回到旧规则治理的环境，会比任何课程教新课更快地重新学会旧课——判断是危险的，沉默是安全的。

8.5 序列与时间表：一代人，反向而行

别兹梅诺夫唯一经久的洞见是时间表，补救应该接受它，而不是承诺机制不允许的更快结果。**立即，且已经开始：**保存——档案复制并存放在党够不到的地方，证词在证人还在世时记录，公民教育在线生产和阅读（CCE-100）——使再教育的材料无论发生什么都存在。**在转型时：**§8.1 的机构（档案开放、受害者登记册、真相委员会）和§8.4 的法律改革，它们需要国家权威，必须由民主授权的机构颁布，正如十月一日提案本身规定的。**在随后的一代人中：**§8.2 的教材方案和§8.3 的学校公民课程，评估标准不是态度调查——一个受惊的人群可以被训练通过它——而是官能本身可观察的恢复：一份敢于无代价地反驳政府的报纸，敢于判决国家败诉的法院，结果事先不知道的选举，以及一个能听见不受欢迎的事实、先问“这是真的吗”的公众。

最后一句检验是本文的，也是别兹梅诺夫的，一句话。道德瓦解完成之时，是事实无言之日。它逆转之日，是事实重新言说之日——而每一个开放的档案、每一个被点名的受害者、每一个被诚实提出、诚实回答的一百问，都在可度量地催促这一天的到来。

结论

用中国大陆记录检验，别兹梅诺夫的框架以修正后的形态存活。修正后它读作：一个垄断教育和信息的执政党，可以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损害一个人口评估真相的官能——不是彻底地，不是不可逆地，也不是不需要持续的制度努力，这正是七十五年后的今天，新教材和新审查系统仍在继续这项努力的原因。别兹梅诺夫的病毒版本引人绝望，或引入对被这种体系塑造的人轻蔑。证据不支持任何一种。它支持工作：保存、说真话和公民教育的缓慢的、制度的、代际的工作——现在就开始，必要时在流亡中、在线上进行；等到档案终于能开放时，在自由中国的学校里完成。

注释

[1] 尤里·别兹梅诺夫，G. 爱德华·格里芬访谈，《Soviet Subversion of the Free World Press》（1984），访谈记录：意识形态颠覆的定义。

- [2] 托马斯·大卫·舒曼[尤里·别兹梅诺夫], 《Love Letter to America》(洛杉矶: W.I.N. Almanac Panorama, 1984), 第 23 页图表: 四个阶段与时长。
- [3] 别兹梅诺夫, 1984 年格里芬访谈, 访谈记录, 道德瓦解的人之论述。1983 年洛杉矶讲座中有一个较短的版本。
- [4] 别兹梅诺夫, 1983 年洛杉矶讲座, 见《Big Think》基于访谈记录的记述, “39 years ago, a KGB defector chillingly predicted modern America” (2018 年, 更新); C 级证词, 措辞如该文所载。
- [5] 别兹梅诺夫, 1984 年格里芬访谈, 访谈记录: 关于合作者“被标记为灭绝”及新秩序的心理冲击。
- [6] 中共中央《关于整顿三风的决定》(1942 年 2 月); 延安整风运动 (1942-1944) 的标准记述。
- [7] 思想改造运动, 1951 年 9 月在周恩来号召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讲话后开始; 《人民日报》对大学教职员工的号召; 技术包括灌输、批斗会、宣传、批评与自我批评, 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思想改造 (sixiang gaizao) 的标准参考记述所总结。
- [8] 爱国主义教育运动, 1991 年启动; 中共中央宣传部《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1994)。
- [9] 赵穗生,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31 卷第 3 期 (1998): 287-302。doi:10.1016/S0967-067X(98)00009-9。
- [10] 郑王,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12)。
- [11] 郑王,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第 4 章: 1992 年起的教材、大学入学考试内容、博物馆和 100 个国家级示范基地 (40 个设在与外国冲突的记忆遗址)。
- [12] 袁伟时, 《冰点》(《中国青年报》副刊) 文章, 2006 年 1 月; 副刊在两周内被关闭、编辑被撤职, 见当时的报道, 以及 Edward Vickers (2009) 和 Gregory Fairbrother (2004) 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综述所引。
- [13] Gary King、Jennifer Pan 和 Margaret E. Roberts,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07 卷第 2 期（2013 年 5 月）：326-343。doi:10.1017/S0003055413000014。

[14] 教育部／国家教材委员会指导纲要（2021 年 7 月），把习近平思想融入各级教材；2021 年秋季起中小学使用习近平思想学生读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2023 年 8 月增设为高校思想政治教材。

[15] 国家教材委员会，2021 年教材指导纲要配套声明，见 BBC 新闻报道“China schools: ‘Xi Jinping Thought’ introduced into curriculum”（2021 年 8 月 25 日）及《中国日报》。

[16] 人权观察，“China: Free ‘White Paper’ Protesters”（2023 年 1 月 26 日）及“The Legacy of the White Paper Protests”（2025 年 11 月 23 日）：2022 年 11 月 24 日乌鲁木齐火灾后的抗议、白纸象征、口号、拘留，以及随后清零政策的放弃。

[17] 自由中国运动，公民教育（CCE-100），《政治迷思 100 问：民主、自由、人权与现代公民》，目录，<https://freechina.live/civic-education-100-questions/>——引言与章节内容（CCE-001-CCE-100），2026 年 10 月 20 日访问。条目标题采用目录中文原文。

[18] 自由中国运动，“October 1 — National Day of Suffering and Freedom”，政策提案（2026 年 9 月 20 日），及新闻稿“Free China Movement Calls for October 1 to Become a National Day of Suffering and Freedom”（2026 年 9 月 30 日），<https://freechina.live/english/english-press-releases-statements/press-release-october-1-national-day-suffering-freedom/>

[19] 邓小平，在北京对戒严部队干部战士的讲话，1989 年 6 月 9 日；邓小平，关于 1989 年动乱教训的谈话（“First priority should always be given to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1989 年谈话，见《邓小平文选》），关于加强思想教育。郑王对领导层教育自我批评的总结：郑王，《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引言及第 4 章。

相关研究

- 《From Mao to the Party-State: October 1, the Constitutional Evolution of the PRC, and the Restor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https://freechina.live/governance-public-policy/third-republic-governance-blueprints/mao-party-state-october-1-prc-constitutional-evolution-democratic-restoration/>

- 公民教育（CCE-100）：《政治迷思 100 问》——<https://freechina.live/civic-education-100-questions/>

其他语言版本（繁體中文、Français、Deutsch、Español）正在筹备中。

版本：v1.0 | 2026-10-20